

社會民主化潛流中的 改革論爭

● 張 翔

當代中國的矛盾正以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廣度和強度表現出來。從國企改革、房產泡沫、股市改革到金融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社會公共意見愈來愈不一致，意見衝突愈來愈頻繁。這些討論涉及面廣、參與者眾，而且往往分歧嚴重，乃是改革開放以來大眾社會討論從未出現過的狀況。正是基於這種局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2005年中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指出，改革共識已基本破裂^①。這種社會內部非程序性的民主化討論呈現出的分歧局面，的確顯示社會共識有待重建。不過，我們有必要更仔細地觀察這些社會內部的民主化討論究竟意味着甚麼。

改革論爭與公共輿論

經濟領域改革共識的破裂首先發端於專業內部之間的分歧^②。2004年，

出身台灣、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職的郎咸平發表演講，質疑國企改革的公正性等問題，掀起一波辯論熱潮。接下來延續到2005年，醫療改革、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的辯論接踵而來，批評和反思改革一時成為網絡輿論和傳統媒體的熱門話題。有媒體因此認為，本來期望2005年是「改革年」，不曾想這一年變成了「質疑改革年」或者「反思改革年」^③。由於改革的批評者和反思者認為，主流經濟學家是按西方主流模式進行自由市場改革的主要主張者，因此，對改革的反思，同時也是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現狀的反思和批評。在郎咸平之後，中國社科院前院長、80、90年代市場改革的重要理論家劉國光，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從不同角度批評了主流經濟學界^④。

如果這些爭論只局限於經濟學界內部，或許批評者和反思者對主流經濟學研究的挑戰是並不會引人注目。

*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諸多師長和同事指點，在此不一一致謝。

好些反駁批評者的經濟學者，並不認為郎咸平或者丁學良在經濟學領域有多大的專業權威可言。但問題就在於，這並不只是經濟學界內部的討論，而是社會公眾的公共政策辯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最重要的因素是大眾的加入，他們積極支持反思改革和批評主流經濟學，從而出現了一邊倒地批評主流經濟學家的狀況。在這一系列爭論中，無論是郎咸平對國企改革的質疑，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對醫療改革基本失敗的判斷，還是原教育部分管財務和助學貸款的副部長張保慶對教育市場化改革的批評，都在網絡輿論中獲得了多數正面的回應。這場辯論也可以大致看做主流經濟學家群體與大眾之間的意見分歧。

大眾在辯論中登場是通過網絡實現的。以往，國家體制內由傳媒精英主導的傳統媒體（包括報刊、廣播、電視等）是公共言論的主要載體，也是略具雛形的公共領域的主要構成者。網絡得以迅速發展之後，大眾隨即成為網絡輿論的主角，根本地改變了傳媒精英獨領公共言論權力的格局^⑥。由於網絡辯論具有非常大的隨意性，這種非程序化的民主辯論也帶有大鳴大放的特徵。儘管如此，如果要說當前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其實反映了市場民主化的潛在潮流，卻並不為過。

熟知西方理論的經濟學家在其改革藍圖中自然也預見到了市場改革必然帶來社會公共領域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對他們主張的改革究竟意味着甚麼，卻難以預見。按照一種主流的現代化規劃，在市場經濟發展、市民階層成長的階段，會產生體現市民階

層利益要求的公共輿論空間，制衡政府權力，支持市場體制的形成和民間資本的發展。這種規劃希望能夠形成一個團結的公共空間來伸張市民階層的利益要求。但是，網絡輿論成形之後的中國公共領域，其實質特徵在於，按人數比例來說，有自由表達能力的一般市民的數量要遠大於資本所有者（還沒有算上尚未接觸網絡的多數農民）；中國的市民公共空間也體現自己的利益要求，但這些要求卻未必是資本家的利益要求。

市場民主潛流中的經濟精英

現實的發展多少有些令主流經濟學家感到失落。對經濟學家群體而言，最關鍵的問題既不在於部分經濟學家的道德操守被質疑，因為畢竟仍然有一些經濟學家用心於學術；也不在於在學術思想上遭遇了多大的挑戰，因為真正的思想者並不怕理論挑戰；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希望完成對社會經濟人的理性啟蒙，但現在不僅他們的啟蒙可能將成為無法完成的計劃，而且愈來愈多的民意在流向他們的辯論對手。

單純的理論分歧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並不難應付。簡略而言，有關各項經濟改革的系列爭論歸結到一點，就是改革本身會帶來問題還是問題出在政府。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官商勾結權貴資本之類「壞的資本主義」現象固然存在，但問題在於政府管得太多，該管的事沒管，而改革本身沒有太多問題，市場體制也沒有甚麼問題，必須要保護私人資本的發展；而少數學者和多數網絡大眾則認為，經

濟改革本身就會帶來腐敗貪瀆、官商勾結、社會不公等等弊病，市場機制發展本身就會帶出無良商人，必須對改革路徑進行反思和重估。前者認為不良份子利用了舊體制，後者認為不良份子利用了改革。

對爭論的各個環節做粗略的梳理，一是此前的改革是否帶來了一些問題。各方歸納不同，但一般不否定公正問題和社會差距拉大的問題。二是這些問題由甚麼原因造成。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是問題主要在政府，在改革得還不夠，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情，原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在阻礙改革；少數學者和多數網絡大眾的意見是問題在改革，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階層製造了種種社會不公，不僅制定改革政策的政府要反思，市場機制和商人階層也要檢討。三是怎樣化解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前者意見是堅持既有改革方向，加大政府自我改革、建立有限政府的力度，管好該管的事情，同時堅持不要干擾私人資本的自由發展；後者意見是靠政府退出經濟領域並不能解決改革過程中已經出現的問題，應加強法治以應對改革過程中的貪瀆問題，以及重新思考產權改革的理論，重新認識國有制與私有制。四是怎樣看待原有體制。前者意見是，決不能走回頭路，必須堅持改革舊有體制；後者意見是，相對於目前改革造就的體制，傳統體制有着以往被忽略的一些優勢。五是怎樣定義這些爭論。前者意見是，這是支持改革還是反對改革的爭論；後者意見是，這是關於走甚麼樣的發展路徑的爭論。六是如何看待爭論對手與政府政策的關係。雙方互相批評對方已經或者希望與政府建立關係，

也都在批評對方的同時，從不同角度批評政府及其政策制定。七是如何看待爭論對手。前者意見是，反對改革者或者別有所圖，或者是既得利益者，而且認為他們利用群眾的盲從掀動民粹情緒反對改革；後者意見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階層，面臨嚴重的道德危機，典型之一是顧雛軍事件中的經濟學家形象。

面對市場民主潛流中的社會公共空間裏群情湧動的輿論，經濟學家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們的改革意見曾經從民眾那裏得到有力的支持，他們深知要推動政府堅定地在他們主張的改革道路上走下去，就必須繼續得到民眾的支持。用中國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社會良心的吳敬璉在《財經》雜誌2006年論壇上的話說，就是，促進政府改革也「要靠所有的公民，行使公民的權利」。他們也深信，自己的思路才真正代表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才真正能夠惠及所有民眾，才真正是民族和國家根本的強盛之道。他們對社會持續而有成效的經濟理性啟蒙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他們卻發現，要一般民眾相信他們的根本利益在於資本的自由發展以及政府退出經濟領域，非常困難。一般工人農民的利益要求和他們對改革的感受，跟資本所有者大不一樣。對於一般工人農民而言，他們在改革過程中感受到社會距離的擴大，以及不平等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他們最根本的利益要求是政府的改革措施要更公正，政府要更能堅持正義，不願看到政府決策只從經濟上佔優勢的社會階層的利益出發。而經濟

學家往往執「改革要有代價、要求人們犧牲」這樣的看法，而且將對改革的批評視為堅持改革與反對改革之爭。因此，他們必然認為經濟學家的診斷並沒有把握住問題的關鍵，並且在「改革和反改革」的定性基礎上進一步將爭論激化。

而且，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最根本的要害並不是經濟利益被剝奪等等層次的問題。相當多的老百姓懷念舊體制，其實又並不想節衣縮食過緊日子，老百姓也知道那時候窮，現在再怎麼不好，起碼生活還是有提高。但是，目前改革對民眾最大的衝擊，並非經濟層次的、利益層次的問題；而是改革不斷在衝擊人們的生活安全感，不斷瓦解各種有序有效的社會秩序，在破壞一般的社會風俗和道德意識。現在改革所造成的問題是社會問題、法律問題、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多數經濟學家習慣的視野。

這種狀況對經濟學家既有的權威造成了根本的衝擊，質疑改革的言論在短時間內超越了他們。他們在非程序性民主化的社會公共空間裏遭遇了空前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和他們意見相左的學者，而在於社會的民主化潛流，在於中國的經濟階層還沒有能力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擔綱者，在於經濟學家的啟蒙事業無法有效應對社會民主化的潮流。

吳敬璉在《財經》論壇發言的最後邀請台下的經濟精英一起領會《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中的一段話，非常典型地表達了經濟學家面對社會民主化潛流的憂心忡忡。這段話說：

自由市場經濟尤其是金融市場是人類創造的最有效的組織生產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是它的發展面臨着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和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兩方面的威脅，這兩個集團看起來地位極其懸殊，可是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使政府對市場採取干預行動，這種行動打着彌補市場缺陷的招牌，卻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而大眾不但不會抗議，甚至還要喝采，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因此受到損害。

吳敬璉的引文非常明確地提出了經濟精英能否爭取大眾，以及如果不能該怎麼辦的關鍵問題。

經濟精英對一般民眾的訴求執何種態度有其自由，但是毫無疑問，排斥大眾、得不到大眾支持的精英群體很難成為真正的精英，在爭取成為社會擔綱者的道路上也不會走得太遠。現在經濟精英階層最大的難題就是面對民眾缺乏積極溝通、建立共識的自覺和能力。吳敬璉的憂慮顯示，自信洞見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的經濟學家群體，處身於工農佔大多數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結構裏，已經面臨着非常艱難的歷史選擇。

一種選擇是順應社會民主化的潮流，尋找有效的途徑，重新贏得社會民意的支持，從而在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的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而且經濟學家必須面對民眾的質疑調整自己。最關鍵的一點自然是如何使自己的學說抓住一般民眾的切身利益感受，重新贏得民心。另外，他們還必須看到自己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即如何讓民眾相信他

們不是有錢人的僱傭打手，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建立自己職業和道德的公信力。這樣，經濟學家群體的當務之急是重新建立自己職業和道德自律，必須明確自己與商界的金錢關係，必須定出規則在甚麼情況下可以拿資本家的錢，拿了錢以後必須公開，不能以經濟學家身份為自己的僱主說話。現在的問題是，經濟學家群體對社會輿論形勢的轉變存在一定的抵觸情緒，不願意檢討自己，也不願意作這種調整。

另一種選擇是，經濟學家群體繼續堅信以所謂經濟理性為基礎的改革思路並不需要太多的檢討，繼續認為普通民眾不了解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也不了解社會與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這樣經濟學家有可能進一步蔑視民眾，甚至希望借政治權威來壓制民意，扭轉社會民主化的潮流。這當然不是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願意看到的走向。

市場社會的共識問題

在社會領域，以往的改革共識的確如孫立平所言已經基本破裂，但是在國家層面，卻未必如此。國家權力內部的共識，以及國家權力與社會互動產生的共識，與社會領域的共識並不是一回事。目前經濟精英階層尚未顯示出超越自身利益、與一般民眾達成共識的主動意願和能力，只是意味着國家權力的改革與建設遇到了社會共識難以達成的挑戰，而並不意味國家的政治精英階層同樣無法以超越性和全局性的眼光，從民族和國家發展的總體性要求出發設計新的議題，引導新的社會共識的形成。

此前的改革進程中所建構的關於改革的共識，從根本上說其實是依靠國家權威達成的。一是因為改革一旦啟動，原有的利益格局便逐漸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得以重組，在此過程中，很自然會有或大或小的利益衝突；在這個基礎上要產生改革共識，很難從帶來衝突的改革措施本身獲得（否則現在也就比較容易繼續保持改革共識），而是有賴於改革意識的權威的形成。當時的改革權威最重要的根據在於國家權力本身的權威，以及它進行自我革命（也即後來鄧小平所說「第二次革命」）的正當性資源。二是因為改革本來就是國家權力主動的自我變革，它可以通過改革的成效來證明改革的合法性，使得社會能夠在矛盾逐漸增加的時候保持一定的改革共識。三是與政府決策相溝通並擁有專業權威形象的專家，主導着社會的市場經濟啟蒙，也為塑造社會的改革共識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隨着社會公共領域民主化格局基本成形並且出現分化，原有的社會共識破裂，以往那種通過經濟增長的成效來證明改革的合法性的辦法，已經難以為繼，而必須進行調整。執政黨整合社會、建構有關改革與發展的社會共識之時，最大的難題恐怕還在於如何處理佔少數然而擁有多數社會資源的經濟精英階層與數量龐大的工人、農民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階層都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力軍，執政黨必須有效地凝聚他們的力量。但是他們不僅利益偏好有根本的不同，而且對事關改革發展的諸種問題也往往會有截然不同的意見。

粗略勾勒目前國家權力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部

分。一是繼續進行各項經濟改革的試驗和推進。不過相較以前，由於近年來爭議漸多，而且這些爭議必然會反映到決策過程中，很自然目前階段改革的推進會多一些迴旋，改革進程會多一些自我調整。聽證會在決策過程中迅速推廣，是表現之一。

二是重新確認自己的執政基礎在於佔公民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深知執政黨必須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支持，才能確保各項改革政策的實施，因此充分吸納了一般民眾的利益要求，從國家發展的總體性角度出發，確定了系列政治戰略。最集中的表述是所謂「五個均衡發展」，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綱領。在這一綱領下，出台了許多具體的政策，比如減免農業稅、重新設計醫療改革方案等等。

從國家發展的總體性角度出發的「五個均衡發展」和「和諧社會」，是否已經建構或者正在建構新的改革共識？經濟精英階層是否願意在這一層面建構新的社會共識？或者說，國家的政治領導階層能否有效地同時整合經濟精英和一般民眾？這要看改革論爭的走向及社會矛盾變動的具體狀況。如果這一新的共識能夠形成，也會成為中國改革發展再出發的新起點。而如果政治精英階層也喪失了社會整合能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恐怕便面臨了歷史性的危機。

中國能否再一次抓住歷史的機遇，通過整合不同利益群體，建立關於改革與發展的共識，避免讓這種社會領域裏的意見分裂演化成政治領域的現實分裂，真正讓中國再平穩發展二十年，還讓我們看未來中國的發展。

註釋

① 見《經濟觀察報》2005年10月12日記者殷練的採訪〈孫立平：改革到了哪一步？〉，該訪問在2005年9月20日下午進行。

② 如就整個中國大陸思想界而言，這種分化要來得早得多。標誌性的分化即是90年代中期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分化。1999年甘陽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演講即題為《改革共識的破裂》。

③ 如2005年12月12日《贏周刊》發表記者趙瀚之文章〈改革年演變成爲質疑改革年——2005進進退退話改革〉。又如《經濟觀察報》2005年12月20日發表孫立平文章〈論「新改革觀」〉，稱「2005年年初時，這年被稱之爲『改革攻堅年』，但實際上這一年卻幾乎演變成一個改革反思年」。

④ 2005年7月15日，劉國光就當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談了一系列看法，提出了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爲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爲指導的問題，這些內容經網絡公開後，在理論界引起軒然大波。2005年10月26日，丁學良在《中華工商時報》上指「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他的着眼點一在於中國經濟學家不用心學術而熱心爲稻粱謀，二在於中國經濟學家還不夠西方化。

⑤ 參見胡泳：〈博客在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5年12月號，頁87-94。他在文中指出：「博客現象的興起代表着平民的崛起。過去的主導話語是國家主義的和精英主義的，而博客話語則是市民主義的，話語權力發生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不止博客，其他網絡發言形式如論壇、新聞跟貼等等同樣如此。